

【明清思想经典丛书】

# 日知录校释

上

【明】顾炎武／著 张京华／校释



岳麓書社

【明清思想经典丛书】

# 日知录校释

上

〔明〕顾炎武／著 张京华／校释

岳麓書社

## 转型时代经典的魅力

### ——代丛书序言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很多经典，而转型时代的经典尤具活力。中国古典时期的周秦时代，出现了一大批经典，后来结集为《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及至晚周时代的《荀子》都可以看做是“周秦之际”转型时代的系列经典。这些经典至今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并逐渐地影响着东亚乃至世界人的心灵。而西方古典与近代之交的转型时代也出现了大批伟大的经典，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均出现了一系列的伟大著作，直接影响了现代人类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心灵秩序。略举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如《神曲》、《十日谈》、《政府论》（上、下）、《利维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伦理学》、《新工具》、笛卡儿的《沉思录》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向近现代性质的工商业文明的转型之中，也出现过一系列具有过渡性质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对于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与激励作用，只是由于近现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大殖民浪潮的冲击下，这些作品长期被湮灭了，直到今天，这些伟大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伟大思想仍然被现代西方文化潮流裹挟的淤泥覆压着，带着灰头土脸的形象龟缩在现代文明的阴暗角落里。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大力宣传，特别是40年代以后，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

庐，继后有萧萐父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前赴后继的发掘与阐扬，这些转型时期的思想家与思想逐渐得以被学界认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转型时期新思想家的著作也陆续被整理出版，特别是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全集也被整理出版了，如《王阳明全集》、《李贽文集》、《黄宗羲全集》、《船山全书》、《傅山全书》、《戴震全集》等，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一转型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还有一些遗憾，如同时期的《方以智全集》就迟迟没有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方以智思想的认识。然而，对于这些转型时期思想家的普及宣传工作，似乎还没有展开，而要普及、宣传这些转型时期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有相应的带有普及与宣传特点的著作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岳麓书社出版的这套《明清思想经典丛书》，对于普及、宣传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的新思想，让更多的人初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开启了迈向近现代的思想历程，将会大有裨益。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萧先生的哲嗣萧远兄所说的，要把萧先生的“早期启蒙说”推广为“早期启蒙学”的一种新的尝试与开端。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该套小丛书的立意不在整全，而在于以点带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带有路标性质的符号，让人们通过阅读、了解这几本著作，以一种盎然兴致继续深入明中叶以后步入转型期的新思想园地。

丛书所选的五本著作，将它们称之为转型时期的经典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放在同时期的欧洲的经典作品中，也毫不逊色。按照业师萧萐父先生的说法，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哲学由中世纪向早期近代转化的分水岭式的人物，而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由王学而发展成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之后的何心隐、李贽等人则非传统儒家名教思想所能羁络，恰恰也印证了萧先生的判断。本丛书中选择《传习录》作为丛书的思想起点，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传习录》不足以全面反映王阳明的思想，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在其中有生动

的体现。该书由其妹夫，也是他的弟子徐爱整理而成，以问答的形式来展开阳明的思想，对于年轻的学人，特别易于接受。以《传习录》为了解王阳明思想的入门书籍，大抵不错。

在黄宗羲《明儒学案》里，李贽并没有列入王门后学的学术与思想谱系之中，这既反映了黄宗羲的学术见解，也体现了黄宗羲的思想敏锐之处。他从思想性质的根本差异处入手，将李贽判定为“非复名教所能羁络”式的反名教人物，因而逐出阳明学的谱系之外。以今人的观点看，李贽在学术上深受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而且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可以纳入泰州学派。然而，就其思想的批判性而言，他实际上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第一人。在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三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里，李贽是作为传统专制社会“异端之尤”的思想家而得到充分关注的思想人物，而在萧蓬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下，1983年版）里，则被定性为16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而且，在萧先生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1982年）一文里，将他看做是中国的哲学烈士，类似于意大利的布鲁诺。李贽的著作很多，然而在当时对年轻学子有深刻影响的是《焚书》与《续焚书》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的哲学讲章，而是一些战斗檄文式的书信和短文、读书杂感与政论文，还有少量的诗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如《童心说》、《答邓石阳》、《答耿中丞》、《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启蒙篇章。

黄宗羲是明清之交的大思想家，他在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上的贡献甚大，《明儒学案》开创了中国断代思想史，其写作体例直接影响到20世纪初期冯友兰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然而，就其在中国思想上的独特性贡献而言，我个人认为，他创作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更有代表性。该书在“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的新政治价值理想的前提下，系统阐述了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并赋予了近代的意义。他通过对君道、

臣道、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之不同，以及“君臣共治”天下，只有职分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划分等一系列新思想的阐发，并提出以学校为养士与政治议政的场所的新政治构想，这些新政治构想显然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道家的“公天下”思想，已经走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边缘，至少已经达到了中国式的士大夫精英民主政治的新领地。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早期近代化的新政治理想虽然不同于洛克等欧洲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想，但就其反对专制政治，提倡民主政治，为更广大的民众谋求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等要求而言，具有思想的同质性，其中的差异既是民族性的，也有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的先后之别，但似乎都可以纳入近现代民主政治的文化范畴而区别于中世纪——如中国宋元之际邓牧的《伯牙琴》，甚至更早期的如魏晋时期的鲍敬言的“无君论”等反君主专制的异端思想。

《日知录》这本著作，语言相对浅白，思想也比较易懂，表面上看是一些读书笔记与札记，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其实不然。该书中不仅有系列的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如卷十二中的“封驳”条、卷十三中“守令”条、卷十七中的“清议”条等，而且也有一种新人性论思想，如卷三的“言私其豸”条等，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以一种实证的、追求真知的方式来对待经典（包括儒家经典）的态度，对于传统经学在清代乾嘉学术中以知识说经新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开创与引领的作用。更进一步地说，在信仰与知识理性转向的关系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清人笔记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都可以看做是深受《日知录》一书学风影响的产物。另外，《日知录》一书重视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路线，对于转型时代的学术创新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提倡的“循根达杪”、“手披枝肄所歧”以求“十分之见”的追求真知精神，与《日知录》通过反复校订所见，以求真知的精神，若合符节。

相对于上述四位大思想家及其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唐甄及其《潜书》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要稍微逊色一些。然而，作为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反专制的思想家而言，唐甄及其《潜书》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对专制君主的批判，对于各种奴性的批判都是非常深刻的。他不仅有“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样震古烁今的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系列批判奴性的文章，重视宰相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的思想，有同情妇女，提倡夫妇平等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可以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反专制政治思想相互补充，并且与李贽以降部分进步男性思想家一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了一股解放妇女的思想潮流。

单就这些著作本身而言，它们都曾经在全集中或者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现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将这五本书放在一起作为一套丛书，恐怕还是第一次。既然是一套丛书，则必有编者的内在想法。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丛书从王阳明开始，到《潜书》结束，隐然暗示着编辑者的一种思想史的考虑，即以王阳明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分水岭，然后着重选择了“明清之际”五位进步思想家带有强烈而鲜明的反专制的思想性著作，似乎以一种路标的形式导引人们对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初具系统的理解。如果这种理解大致不差的话，则该套丛书就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当然，由五本书构成的这套丛书远不足以全面反映该历史时期的新思想全貌，但作为一种路标还是可以胜任的。通过对这五本经典著作的阅读，可以引导人们进一步地了解明清之际更加丰富的新思想，从而了解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如何通过传统经典的研读而开创中国文化新生面的精神努力。

本套丛书采用导读与简明的脚注，不翻译，要求阅读者依靠自己的能力深入经典之中。而导读只是一种引导与指路。这既是相信读者，给读者预留了巨大的思想空间，也是尊重经典，以免通过翻译破坏了经典自身的语言风格。

系统阐述这套丛书中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不是本篇短小序文所能胜任的工作。承岳麓书社的美意，给这套小丛书写篇序，择其要而对上述五本经典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作一提示性的说明。由于最近诸事繁多，再加上身体不适，无法有充沛的精力按要求写篇有分量的序，只能以此不轻不重的小文塞责了。

是为序。

吴根友

2009年12月3日

## 前 言

顾炎武一生著述极富。《日知录》是札记体裁，全书32卷，共计1020条，前后积聚30余年，荟萃了顾氏一生著作的精华。和顾氏的其他著作处境类似，《日知录》的刊刻流传历经坎坷，确是事实，但如果以今日眼光来看，《日知录》以及顾炎武的大部分著作最终都保存下来了，虽各本皆不圆满，但总体上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 —

关于《日知录》各卷内容的分类，首先顾炎武本人有一简要的概括。在《与人书二十五》中，顾氏说道：“《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

其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有一种区分，说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四库全书》本的卷次是和刻本对应的，由于抄本卷次与刻本不同，所以徐文珊又重新作了划分。在《原抄本顾炎武日知录评介》一文中，针对顾炎武本人之说，徐氏认为：“依原抄本所分卷帙，一至十卷为经术，其次序为《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十一至二十九卷，为中篇之治道，范围极广，举其要者计有：地方政制、中央政制、选举、田赋、土地制度、财政经济、吏治、政治得失、风俗、婚丧祭礼、科举、文字、史学、古代郡国制度、姓氏谥号、伦理制度、掌故、正史述评、经史子集注疏述评、华夷风俗等。其余三卷为博闻，内有天文、五行、怪异、鬼神、地理、杂记等类。”

仍然是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四库提要》的划分，徐文珊也有所调整，大略说道：“一至八卷讨论《五经》，九十两卷讨论《四书》。十一至十六卷讨论中央地方政治，兼及社会制度，十七卷讲风俗，十八卷言礼制，十九卷讲科举，二十卷讲心学等，二十一卷上半言文，下半讲史，二十二卷言诗赋，二十三、二十六杂考古事，二十四五言姓氏、称谓、官制，二十七卷评史书，二十八卷论注疏，二十九卷中外服制，三十卷言天文及神怪，三十一卷讲地理，三十二卷为博闻，亦即杂考。”

这四种分类，可以简化为下表：

| 顾炎武 | 经术                                                        | 治道                                                                                           | 博闻                   |
|-----|-----------------------------------------------------------|----------------------------------------------------------------------------------------------|----------------------|
|     | 1—10                                                      | 11—29                                                                                        | 30—32                |
| 徐文珊 | 经术：《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 治道：地方政制、中央政制、选举、田赋、土地制度、财政经济、吏治、政治得失、风俗、婚丧祭礼、科举、文字、史学、古代郡国制度、姓氏谥号、伦理制度、掌故、正史述评、经史子集注疏述评、华夷风俗 | 博闻：天文、五行、怪异、鬼神、地理、杂记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库提要 | 1—7 | 8—12 | 13 | 14—15 | 16—17 | 18—21 | 22—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      | 经义  | 政事   | 世风 | 礼制    | 科举    | 艺文    | 杂论名义  | 古事真妄 | 史法 | 注书 | 杂事 | 兵及外国事 | 天象术数 | 地理 | 杂考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文珊 | 1—8  | 9—10 | 11—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26 | 24—25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     | 《五经》 | 《四书》 | 中央地方政治兼及社会制度 | 风俗 | 礼制 | 科举 | 心学等 | 上半言文下半讲史 | 诗赋 | 杂考古事  | 姓氏、称谓、官制 | 评史书 | 论注疏 | 中外服制 | 天文及神怪 | 地理 | 博闻亦即杂考 |

从上述分类中可以看出，第一，凡在同一卷中的条目，大致是按相同的性质编排的；第二，全书各卷的先后次序，大致是按经术、治道、博闻编排的。

对比初刻八卷本，可以明显看出，现在《日知录》全书中的1020条（徐文珊统计为1115条，也有学者统计为1013条），撰写的时间前后不一，修改和定稿经过了较长的过程，现在所见全书的结构并不一定出于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很可能是最后调整的结果。刻本和抄本卷次的不同，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过分细化各卷的分类，恐怕意义不大。分析的眼光，不如整体的眼光来得重要。

有学者认为,《日知录》以占篇幅最多的治道部分最有价值,其实未必如此。《日知录》上言经术,中言治道,经术治术道器不离,书与事并不截然分开。而先王之道无所不在,天地无不载也,无不赅也,所以下篇博闻也并不在视野之外。道器合为一个整体,所以《日知录》全书也是合为一个整体,并无明显边界,假使能够深通,无不可以通达。我国的学术传统是重视整体,或者说是“深通”,分篇分卷也只是为了有“条理”而已。

有学者称:“《日知录》是一本随笔记录性质的百科全书。”“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无不涉及。”<sup>①</sup> 这种说法,更是隔得远了。

## 二

《日知录》通行的版本,有顾炎武自刻八卷本,潘耒遂初堂本,黄汝成集释本以及民国年间发现的“原抄本”。

顾炎武于上章阁茂之岁(康熙九年,1670),刊刻了《日知录》八卷。六七年后,又有重印。最初的刻本顾炎武在目录下写有四行小引,重印时更增加了十二行《初刻自序》,说到当时该书已续写到二十馀卷,但因未能定稿,故而仍然“先以旧本质之同志”。这个八卷本学者称之为符山堂初刻本。

符山堂初刻本传世较罕,抗战间,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潘承弼)获得一种,有顾氏《初刻自序》,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在《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前有潘景郑跋,后有傅增湘跋。

此外,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康熙九年八卷本,有傅增湘跋语,

<sup>①</sup>翰林版高中国文第一册第五课《廉耻》参考资料,国立杨梅高中教材资源中心网, <http://www.ymhs.tyc.edu.tw>.

不知是否为潘氏旧藏。傅增湘则早从缪荃孙遗书中购得初刻本，著录文字见于傅氏1930刊印的《双鉴楼藏书续记》。而陈祖武先生又从国家图书馆中翻检到一种“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事见陈氏《〈日知录〉八卷本未佚》一文<sup>①</sup>。

关于八卷的符山堂初刻本与后来三十二卷刻本的异同，陈垣《日知录校注》有详尽的比对。

八卷本还有抄本流传。顾炎武《初刻自序》已曾说到“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后潘承弼在坊肆获得一种，“封面有光绪癸卯舜水仲虎腾氏跋语，称是先生手笔，然细审字迹，实不类。惟全书涂乙校改处甚多，意必当时稿本而非先生手录者”。因条目较刻本增多，有140条而非116条，故潘氏以为“或成于初刻之后而续有增改者”<sup>②</sup>。同时，邓之诚也曾得见一种“八卷稿本”，邓氏判断实为抄本。“此本称为‘亭林原稿’，唯书‘商’作‘𠂔’，‘達’作‘達’，徐‘市’作‘市’，简写‘權’作‘权’，似不出亭林之手。目录后有字一行云：‘一卷二卷颇有增改，即《与寅旭书》（王锡阐）所谓今已增改多者是也。’亦不似亭林口气，疑估人故意作伪以实其为稿本耳。”<sup>③</sup>

在《日知录》初刻刊行以后，顾炎武本人曾经表示：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sup>④</sup>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sup>⑤</sup>

这一方面表明了顾氏学无止境故著书亦无止境的理念，一方面也包含了《日知录》生前不刻定本的计划。

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氏谢世，享年七十。又过了十三年，

①刊《读书》1982年第1期

②见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

③见邓氏《桑园读书记》。

④《与杨雪臣书》。

⑤《与潘次耕书》。

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顾氏的弟子潘耒（字次耕）刻印出《日知录》三十二卷，学者称之为遂初堂刻本。

潘耒为顾炎武高足。“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sup>①</sup>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顾氏卒后，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缮写成帙”，“携至闽中”，“鸠工刻之以行世”。<sup>②</sup>

除了《日知录》，潘耒还刊刻了顾炎武的诗文集，成《亭林遗书》二十七卷，并且“犹以未及刊《肇域志》为憾”。<sup>③</sup>所以称潘耒为《日知录》的功臣、顾氏的传灯之人，亦不甚过。

潘刻本使得《日知录》很快流行起来，清初学者手中多有。实际上四库开馆时，所采用的“内府藏本”《日知录》三十二卷也是潘耒的遂初堂刻本。

但是潘刻本也有问题，至民国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抄本”出来，人们才知道，所谓“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馀删句换字，不可遽数”<sup>④</sup>，其实都是潘耒所为。

在潘刻本之后出现的《日知录》版本，当属《四库全书》的抄本。《四库全书》纂修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五十二年（1787）间。《四库全书》抽毁《日知录》，确有实据。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到《日知录》的抽毁散页，共计42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馀稿》，此项材料遂公之于众。

在《〈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馀稿》中，标有“删”、“涂处全删”者约十馀处，另有墨圈多处，其他则标为“抽”、“换”、“换写”、“接写”、“照写”、“另行写”、“提另下行”、“提起另行写”

①《清史稿·文苑传》。

②《日知录·潘序》。

③佚名《清代学人列传》。

④《黄侃校记序》。

等，最多的是标出某行某行。

《抽毁餘稿》的42页所涉及的条目，有“都令史”、“吏胥”、“宗室”、“辅郡”、“大臣子弟”、“画”、“张公素”、“二字姓改一字”、“北方门族”、“阁下”、“相”、“杜子美诗注”、“行膳”、“赌博”、“骑”、“驿”、“驴羸”、“国语”、“诈称太子”等，大部分都非《日知录》的敏感条目。其中有的条目《抽毁餘稿》标明删改的，《四库全书》实际并未照办。如“大臣子弟”条，《抽毁餘稿》加墨圈，标明“删”，实际未删，抽毁散页与文渊阁本各行首尾完全相同。“相”条《抽毁餘稿》加墨圈，文渊阁本实际未改。“国语”条《抽毁餘稿》加墨圈全删，文渊阁本实际未全删。

《抽毁餘稿》中所见比较典型的删改，是“骑”条和“二字姓改一字”条。如将“胡服”改为“变服”，“鞑靼人”改为“来降人”，“华人”改为“土著”等，是《四库全书》编纂中最为常见的。

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比对，《抽毁餘稿》对《日知录》删改最严重的是完全删除了“左衽”、“徙戎”、“三韩”、“胡咙”、“胡”五条。“徙戎”条，《抽毁餘稿》墨圈八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三韩”条，《抽毁餘稿》墨圈五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但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都保存了目录。“胡咙”、“胡”二条相连，《抽毁餘稿》墨圈六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均不见。但是“左衽”条，《抽毁餘稿》仅见墨圈半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也不见了。可见各条情况也并不一律。

与潘耒刻本比对，潘本完全删除的有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和卷二十九“胡服”二条，另将“夷狄”一条改题为“外国风俗”。“素夷狄行乎夷狄”和“胡服”二条，潘本尚保留了目录，后来黄汝成《集释》本保留了“素夷狄行乎夷狄”的目录，而删除了“胡服”目录。四库本不见正文，遂将目录完全删去。至于“夷狄”一条，既已改名，四库本因之，也以“外国风俗”题名。

潘耒之所以删改《日知录》，肯定与他先曾参预纂修《明史》的经验有关，在当时依例办事，纯属一种可行的方案。然则对潘耒作过多的批评，并无太大意义，而四库馆臣的继续删改，其实亦只是继续依例办事而已。

道光十四年（1834），上距潘耒遂初堂刻本 140 年，黄汝成刻成了《日知录集释》，稍后刊刻的还有《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

据《集释》所附的征引姓氏，自潘耒、阎若璩以下共计 96 家，其广博宏富，为学者所盛道，黄汝成亦被称为潘耒以后《日知录》的第二功臣。

《日知录》三十二卷潘耒刻本的流传，有经义斋刻本（年月不详），有辽宁所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另据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有乾隆六十年（1795）重刊本。大约同时还有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到道光间，尚有九年（1829）刻成的《皇清经解》本和十二年（1832）的鄂山刻本。可知即在《四库全书》完成之后 6 年，潘本已开始民间广泛重刊翻刻。推测 90 余位学者所用都应当是潘刻本或以潘本为底本的重印本。<sup>①</sup>

而到同治、光绪及民国，潘刻本便很少重印，大量刊行的都是黄汝成的《集释》本。如同治七年（1868）汉阳朝宗书室活字本、同治八年（1869）广州述古堂重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1877）重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印书局石印本、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元年（1912）武汉湖北官书处刻本、光绪及民国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1928 年及 1945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28 年及 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等等皆是。

<sup>①</sup>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有佚名所录阎若璩批注，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有钱泰吉跋文并录，苏州市图书馆所藏经义斋刻本有陈澧批校，可略见一斑。

虽然黄汝成《集释》一开始也是力抵学者以“鸿通瑰异之资”，“隳败于词章训诂褻绩破碎之中”<sup>①</sup>，而其引文则确有不厌其烦之弊。盖因《日知录》一书本极淹博，初学受读，如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至于河水浅深，浩瀚难明。顾氏往往放论经史百家，而又往往戛然而止，虽然倡导考据，以期实事求是，其书却不遑纠缠史文考证，颇有意在言外之旨。故《集释》虽详，客观上则引导读者追寻细节，如“海师”、“海运”等条，《集释》连篇而下，各近万字，反使顾氏著述本旨愈益不明，是其弊端。

古人论世，有所谓盛世、叔世、季世、末世、乱世诸说，时世不同则出处进退亦各有异。嘉庆、道光之际，时势大变，与鼎革、创业时期的学者相比，境界视野都趋于细腻琐碎，亦属必然之理。

黄汝成亦曾见过《日知录》抄本，《集释叙》中有“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一语，《刊误序》中有“又得原写本以校潘刻本”一语。故黄侃责之曰：“黄汝成作《集释》，屡言‘以元本校’，今本此诸条汝成即见之而亦讳言之。”<sup>②</sup>潘承弼叹曰：“惜黄氏于禁违处又略而未及，又未快人意耳。”<sup>③</sup>实际上，黄汝成应当是据原写本补回了“李贽”、“钟惺”二条。这二条潘刻本全删，《四库全书》本亦删。《集释》无所征引，可见诸家类多未见。但是黄汝成又有削改，对比抄本可知，“李贽”条“昔晋虞预”以下一百五十字为黄汝成《集释》所删，抄本有。“钟惺”条则改“钱尚书谦益文集”为“钱氏”，改“今”字为“当时”，抄本未改。

抄本《日知录》三十二卷，1933年由张继购得，章太炎得见，交弟子黄侃写出《校记》，<sup>④</sup>“原抄本”一事遂公之于众。

①《黄叙》。

②《校记跋》。

③《日知录版本考略》。

④刊1933年11月《归纳》第2期，又有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刊本。1936年复由黄氏弟子龙榆生（龙沐勋）以“量守庐”名义刊行。